

記憶的香港，記憶的也斯

金惠俊

到底該怎樣說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

大約30年前的1980年代中，作為訪問研究生，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短暫學習過。當時韓國將中國看作敵對國家，不用說中國的出版物，就連Red Star Over China (Edgar Snow) 等等與中國有關的部分書籍也被列為禁書。在這一問題上，臺灣也是同樣的情形。臺灣的圖書館及書店，根本找不到登載有魯迅、郭沫若、茅盾或是老舍、巴金、沈從文等名字的書籍。因此，韓國人若要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既無去中國的可能，也無去臺灣的必要。

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在香港所接觸的書籍，有的只是過去曾聽說過的，有的甚至是以以前聞所未聞的。或是從王瑤、唐弢、劉綏松、林志浩到司馬長風、李輝英、林曼叔，或是從新文學大系到阿城、戴厚英，一味地讀了又讀。宿舍食堂裡的皮蛋粥、雲吞麵、乾炒牛

河、揚州炒飯或廉價的奶茶、普洱茶等，我吃膩了喝多了以後，也慢慢開始讀到金庸、梁羽生或是框框雜文，但我的閱讀重點仍都與中國相關。我也許從黃繼持和盧瑋鑾兩位那兒聽到過香港文學的一些情況，但也僅此而已。我既不清楚關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種種始末，也並不關心劉以鬯、西西等作家如何又寫出了何種作品。因而，對於那個時候可能剛從美國回來的也斯——雖從十多年前起就在文才與快筆方面嶄露頭角——更是無從知曉。

第一次見到也斯，是在時隔近二十年後的2004年於首爾舉行的某個學術會議上。會議歷時僅兩三天，日程匆忙，又要與潘耀明、王潤華、陳芳明、藤井省三、藤田梨那、許福吉、柳書琴、朴宰雨等眾多學者交流敘舊，也斯和我二人都僅是與會者之一。只是我作為他的討

論人，又和他一起共同主持分組，也算比其他人多接觸的機會。當時，我感覺他的為人比他的文章更出類拔萃。他的話語隨心所欲，態度親近和藹，思維自由奔放。特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從首爾的街頭風景，到韓國的大學生活，他對事事都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例如，來到與香港摩羅上街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首爾仁寺洞，用餐時對米酒和蔥餅等韓國的酒類及飲食逐一詢問，刨根問底的程度另人倍感意外。後來每逢閱讀他的《韓國散墨》、《光慶四章》等文章時，我一人獨自會心地微笑。

我們的緣分從那時開始。起初也斯說的話並不那麼易懂。既因為圓圓的聲線，有些囁囁的口音，其帶有香港語調的國語（普通話），也因為他豐富多樣的想想法並不那麼易於消化。然而，幾次見面之後，理解他的話變得容易多了。這不僅是源於我逐漸熟悉了他的腔調，也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正式開始研究香港文學的關係吧。其實，我和他相識的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對香港文學有所關心，甚至利用一年的研究年到——被稱為「香哥華」（Hongcouver）的——溫哥華，向加華作協的陳浩泉、韓牧等討教。

我對也斯的特別感覺並不單純是因為他文學創作、學術觀點上的成就。反而是他的文章和話語所深藏其中的那種激烈的思考、和煦的感性以及刻苦奮鬥的努力。

那是在2005年的冬天。應也斯之邀，我到嶺南大學做為期兩月的訪問學者。一般海外來者恐怕不易瞭解某作家或學者的日常生活，但我有幸見到他的一些日常性的面貌。我看到他在學校裡與教授、學生、職員、僱員等的

所有人都灑脫相處似的。特別對於學生來說，他就像是倫理教科書中出現的老師一樣。有一次，在訪問他的研究室時，他完全不顧身患重感冒，為了嚴守與學生的約定，仔細批改作文作業。還有，在參加中文系的聯歡會時，學生們爭相要來與他乾杯，要求與他合影。那真是再無第二個《西廂魅影》中的何方。也正因如此，他的門下才會出現了游靜、黃靜、陳智德、黃淑嫻等這樣眾多優秀的弟子吧。

當時也斯雖邀請了我，但正巧我馬上有研究年，他有些遺憾。其實在那段時間內因時間不足，他不斷縮短睡眠時間進行寫作，後來終於得到研究年，也就更為難得。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情，具體的情況雖有所不同，但能夠擺脫學校的行政瑣事而全力投入研究，這其中的好處，我最為瞭解。當然他多樣的活動，廣泛的交遊，豐富的著作，無限的活力又是另一回事。從物理學角度而言，同樣的時間，似乎他掌握了比其他人多活幾倍時間的方法，真是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自然而然，我與也斯時常在學術活動的場合上相見。大多不在香港就在韓國，有一次竟相遇在北京。那是2009年10月底。收到學術會議的日程表，竟發現他和我被安排在同一組發表。可是，開幕式也不見他的身影，直到下午分組討論開始時才出現。原來是因為會議當天才能抽身從香港抵京，而他還是依舊那樣繁忙、熱誠。現在想想，雖然媒體還沒報道患病消息，可那時他肯定已經得知自己的病症了。但儘管這樣，他還是參加了事先承諾的學術會議，並一直堅持到閉幕式，而他什麼也沒有流露出來。

那之後我與也斯見過兩次。一次是2010年夏天的香港文學節。我受香港圖書館的邀請來港講演，病中的也斯親臨講演場。活動結束後，我們先繞著維多利亞公園半圈後，經過公園裡面步行至位於銅鑼灣的他家。戴著以往未曾見過的帽子，比以前臉龐瘦削，比以前語速稍慢，但仍然說「控制得住」，他的態度依舊讓人感到從容、溫暖與關懷。那天我並沒有進入他的家中。那種程度的散步對他來說已經是辛苦的事情了。另一次是在同年冬天，參加陳平原、陳國球等主管的學術會議之時。應他與陶然的邀請，我的研究生宋珠蘭、呂曉琳、高慧琳，以及黃萬華、黃淑嫻、黃勁輝、陳柏薇、蕭欣浩等聚在了一起。他在這天主要談論了如何使韓國等國家瞭解香港文學。那麼開朗快活，看起來反而比上次更有活力。然而，我的內心還是不安的。過去我在母校高麗大學擔任助教時，有一位恩師得同樣的病去世，記得他在患病期間也曾突然身心甚佳。

回國後我與學生們一起稍微修正了我們的計劃。那時我們有系統地在韓國介紹港臺文學和華人華文文學，正在準備包括西西《我城》在內的第一系列，並決定在第二系列中最優先翻譯也斯的作品。最終於去年即2012年秋天，我與宋珠蘭共同翻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韓文版得以出版，高贊敬在陳智德的協助下推出了《香港詩選1997—2010》的韓文版，該詩選在開篇部分收錄了〈非典時期的情詩〉等也斯的四首詩。在此期間，雖然彼此再未謀面，但互相不斷聯絡，我一直以為他仍是「控制得住」。於是我和我的學生們決意舉辦第二

系列的出版發佈會，並邀請也斯前來參加。他表現出了相當大的熱情。但幾乎就在最後階段傳來無法出席的消息，從那時起他回覆電子郵件的速度也明顯緩慢下來。

距最後一次見到也斯已兩年多了。香港文學早已獲得世界和本地的正確評價。對我來說，他是我所尊敬的學界前輩兼同僚，親愛的異國兄長兼朋友。但事實上，我對他的很多情況不夠瞭解。追究起來，我和他的緣分並未經歷長久的歲月，每次相見時間又是那麼短暫。甚至他心裡如何看待我，我根本不知道。他可能把我視為眾多海外相識中的一個，也可能僅將我看作是一個韓文翻譯者。若是他視我超過這二者之上，則於我實乃一大幸事。但這個解答，現在暫時無從知道了。

如今也斯成了記憶。結識他不久時，與陶然一起去鰂魚涌的某家茶館，他應我之邀來釜山大學演講時到溫泉場的酒吧與我及夫人三人一起喝生啤酒，在屯門的一家餐廳與貌似羅傑的西方學者及眾多學生共度時光，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玻璃上面印著《鴛鴦》一詩的餐廳裡吃私房菜，平安夜裡在他家吃令堂做的粵菜，……這一切固然都很寶貴，但只成為記憶中一塊塊小小的碎片。現在他是與三十年前開始的「我的香港」幾乎一樣的，我將會隨時追索著與他相關的記憶，不管是我的還是別人的。而且我將會有時變得混亂，那些究竟是回憶、錯覺，還是想像、虛構？我可能每逢這樣的情形，就開始自言自語：也斯，也斯，您和您的香港，為什麼這麼難說？

金惠俊 韓國公立釜山大學文學院教授